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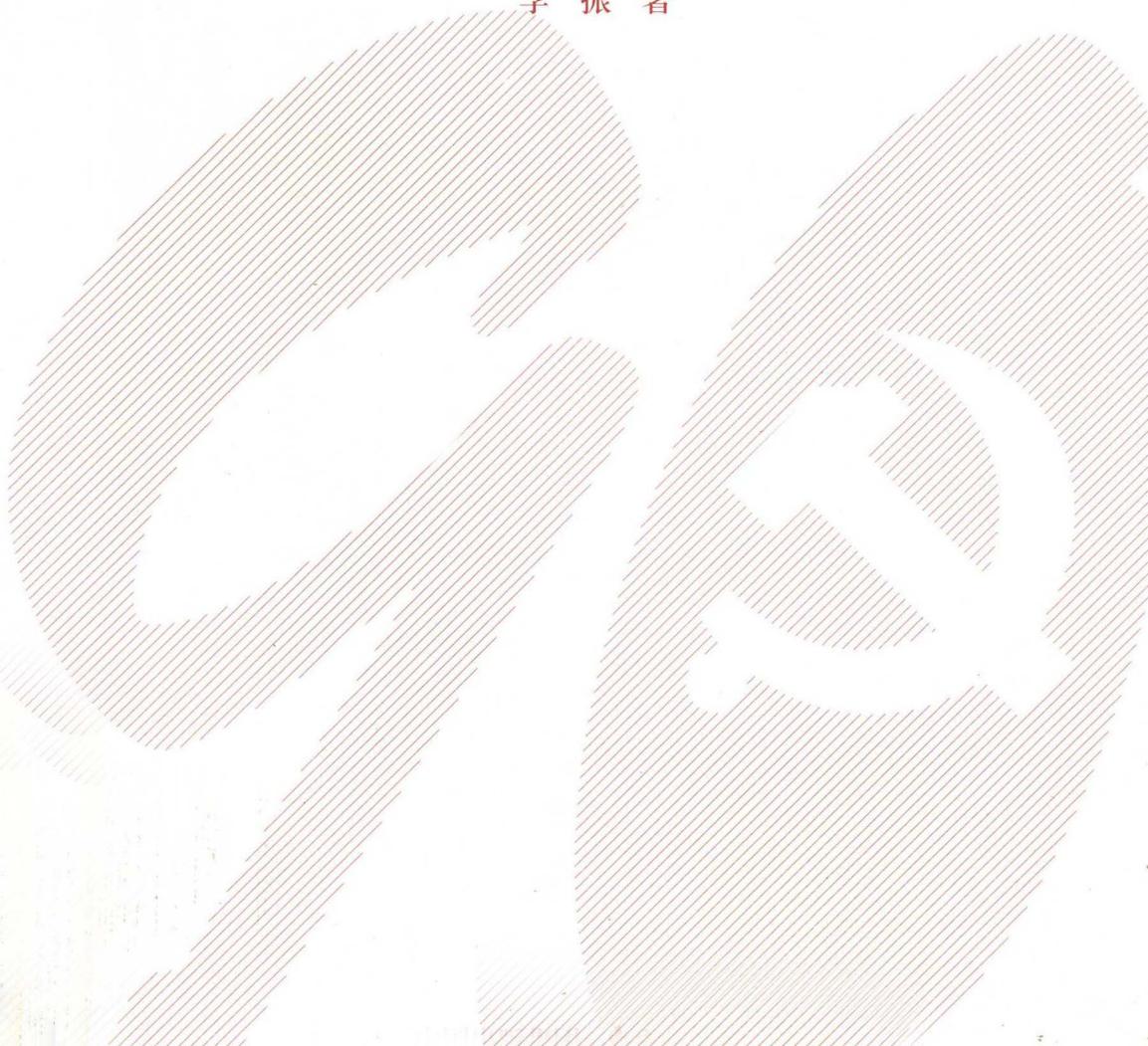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书系

社会进步运动的 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发展历程的当代反思

李振著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书系

社会进步运动的 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发展历程的当代反思

李 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进步运动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发展历程的当代反思 / 李振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1. 9

ISBN 978 - 7 - 5473 - 0405 - 1

I. ①社…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3287 号

社会进步运动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发展历程的当代反思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 - 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 × 1020 毫米 1/16

字 数：440 千

印 张：26.25

插 页：2

版 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405 - 1

定 价：45.00 元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书系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2010年7月1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公共媒体刊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学术活动项目征集公告》，征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围绕建党九十周年而开展的学术项目。其中，征集到的研究著作经相关专家严格评审，共有二十六种优秀著作入选，内容涵盖党史、党建、政治学、哲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部分反映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近年的相关研究成果。该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书系的出版得到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资助，在此谨表谢意。同时，我们也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东方出版中心

2011年5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价值	3
一、从社会进步到社会进步运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主题和实践特征	3
二、政党发展史：基于社会进步运动的反思	8
三、社会进步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融洽性：历史与挑战	13
第二节 研究思路及内容	19
一、历史与逻辑前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0
二、中国共产党参与并领导社会进步运动的历史逻辑	21
三、中国共产党参与并领导社会进步运动的时代逻辑	22
四、中国共产党参与并领导社会进步运动的主体逻辑	22
五、中国共产党参与并领导社会进步运动的文化逻辑	22
第三节 研究视野及方法	23
一、唯物史观视野	23
二、历史哲学及社会哲学方法	25
三、解构与批判方法	26
 第一章 历史与逻辑前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7
第一节 大国兴衰与社会进步运动	28
一、大国的崛起：近代中国的参照系	28
二、近代中国的衰落：根据与出路	29
三、马克思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32
第二节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历史反省	36
一、主体选择样式：走出兴衰逻辑的不可能性	36
二、逻辑方式：改良抑或革命	45
三、民众觉醒：开启中国社会进步运动之路	50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参与并领导社会进步运动的历史逻辑	54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进步运动的内在诉求	55
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直接影响与参照	55
二、五四运动：青年人的理想与现实	58
三、交锋：思想竞争中的马克思主义	62
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运动的逻辑指向	67
第二节 国共两党初步竞争社会进步运动的主控权	68
一、孙中山与国民党创新	68
二、国共合作与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客观选择	73
三、分裂：比较国共两党参与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内在逻辑	75
四、长征：共产党参与社会进步运动的逻辑转折	78
五、超越“左与右”：中国共产党幼年参与社会进步运动的历史反省	79
六、从反省到行动：以“土地革命”的名义	81
第三节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进步运动	87
一、时代主题的变化与社会进步运动的衡量标准	87
二、国共两党的抗日逻辑及其合作限度	89
三、抗日与社会进步力量的此消彼长	108
第四节 解放战争与中国社会进步运动	112
一、和谈、和平与中国社会进步运动	113
二、“人与物”的辩证法：从解放战争看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决定力量	117
三、宣言与公告：透视“解放”的进步逻辑	123
第五节 共产党参与并领导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逻辑主线	129
一、从“寻找理论”看中国共产党“思想智慧”的发展逻辑	131
二、从“唤起民众”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代表”的发展逻辑	133
三、从“超越左与右”看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的发展逻辑	136
四、从“武力保障”看中国共产党“自我崛起”的发展逻辑	138
第三章 时代逻辑：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进步运动与中国共产党	140
第一节 改革开放：开启当代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新起点	141
一、建国 30 年：“改造财富”运动	142

二、财富文明：当代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主流逻辑	149
三、从边缘到中心：中国当代社会进步运动的逻辑路线	175
四、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当代社会进步运动逻辑的深度 关联	181
第二节 和谐社会建设：当代社会进步运动的使命与逻辑	187
一、和谐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克服和纠正	188
二、追求和谐社会：中国传统社会进步运动的历史精神	199
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当代社会进步运动的 价值与实践	202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参与下的全球社会进步运动	204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社会进步运动的经典理论	205
二、世界社会(共产)主义运动现状及其逻辑挑战	210
三、中国共产党参与全球社会进步运动的可能与现实条件	214
四、未来社会进步运动判断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218
第四章 主体逻辑：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进步运动的参与者与领导 力量 225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参与并领导社会进步运动的主体根据	225
一、独立自主、国富民强：中国共产党主体逻辑的现实起点	226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民族性：中国共产党主体逻辑的 旗帜与灵魂	232
三、人民+武装：中国共产党主体逻辑的物质力量	239
四、扎根：中国共产党主体逻辑的空间根植及其拓展	258
五、以革命的名义：中国共产党主体逻辑的实现方式	267
第二节 敌人与朋友：鉴别与扩展社会进步运动的参与者	273
一、“我是谁”：敌友关系的前提条件	274
二、敌人与朋友：社会进步运动的中国视角	279
三、统一战线：“敌友关系”的综合判断	286
四、边界游移：当代社会进步运动中“敌友关系”的扩展及其限度	293
第三节 反省与重塑：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主体诉求	297
一、确定主体：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客观选择	298
二、主体性危机与挑战：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惨痛教训	303
三、主体建设：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经验与反省	312

第五章 文化逻辑：中国共产党参与并领导社会进步运动的内在精神	324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文化特质	326
一、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逻辑起点	326
二、从共产主义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精髓	328
三、“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凸显文化的变革与超越	340
四、鲁迅精神：透视新文化精神的经典个案	344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当代社会进步运动的文化理解	348
一、社会主义语境下“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运动”之间的关系逻辑	349
二、“高与低”：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偏向	358
三、扎根社会进步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之路	360
第三节 面向未来进步运动的文化命题：“反资本文明”如何可能	363
一、“反资本文明”如何可能	364
二、“反资本文明”的力量聚集如何可能	372
三、“反资本文明”的真正践行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未来使命	376
结语	379
第一节 社会进步运动视野下的党建难题：个体与群体、当下与未来的纠结	379
一、“个性”与“党性”之间的矛盾	380
二、“社群化”与“党建形式”之间的矛盾	382
三、“当下”与“理想”之间的矛盾	383
四、“创造性的历史”与“缺乏创造性的未来”之间的矛盾	385
第二节 党的建设：从历史走向未来	386
一、干部本位	387
二、学习创新	389
三、文化精神	390
四、社会调控	391
五、交往对话	392
参考文献	395
后记	407

导　　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历经血雨腥风、风云变幻，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中国人民主体诞生”的标志，是新中国诞生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意义，以前被迫跪着、趴着、爬着、压着的“奴化情形”一去不复返了。试想有什么能比这更能令中国人民激情澎湃、豪情万丈，焕发出建设新中国的昂扬斗志和忘我精神呢？在复杂多变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开展了具有“开天辟地”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令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发展逻辑“改弦更张”的伟大意义，“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①。

在面临世界“资本文明帝国”的入侵以及国家“一穷二白三弱”的境况下，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行动”向世界表明，自“她”^②诞生以来就一直成为带领中国人民走出落后、贫弱、备受欺凌和压迫的“封建逻辑”、“资本逻辑”，走向民族独立、富强、进步、文明的“新民主主义逻辑”、“社会主义逻辑”的绝对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与社会进步运动”之间实现了紧密的结合，超越资本主义，以“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运动方式，使中国面貌焕然一新。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务实的理论以及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练，赋予中国共产党拥有“内在而必然”的“合法性资源”。一些人被以“资本文明”为衡量标准的历史观所肢解、歪曲与“过度诠释”，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解释为“历史偶然性”，是当前党的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一个严峻挑战。“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③“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② 如果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一心救中国，她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她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她坚持抗战八年多，她改善了人民生活，她建设了敌后根据地，她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与《东方红》“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并置起来考察，可以发现这两首歌词具有“互文见义”的修辞特征。而“她”则更强调促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女性形象”，“共产党”就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母亲”和“精神家园”，“寻找组织”就是要“寻找母亲”、寻找内心的“皈依”。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①

问题在于：历史是我们的“出生证明”，表明我们“从哪里来”，并要求按照其所指引的方向前进。但是，在“资本文明”无比强盛和处于绝对地位的条件下，“全球空间”存在着被资本所挤占、霸占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正如邓小平所说：“总结历史”的目的，不是着眼于“历史功过”，更重要的是“为了开辟未来”^②。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充分证明，我们不仅要回答“从哪里来”，更要解决“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仅限“中国革命史”的反思，那么所获得的就是越来越具有“历史存在论”意义上的“合法性”，属于“用历史论证现实”的“合法性”。尽管任何当下的“合法逻辑”无不是由“历史逻辑”所产生和决定的，但面对更加“不确定”的未来，这种仅限于“历史逻辑”的陈述方式还仅仅是“合法性问题”的“一个维度”、“一个面向”而已，并不足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充分证明”^③。在“资本文明”越来越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文明范式”的条件下，如果不解构当下越来越繁盛、越来越势不可挡的“资本文明”，就无法真正完成对于中国共产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合法性的“完整”的解答和证明^④。

可喜的是，注重“历史与未来”双重维度、双重场景的论证，强调“未来挑战”已成为当前政党研究及其实践的一个愈加紧迫的时代课题。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学者们，无不注意到“中国未来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客观关联，关注、关心中国共产党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前途。“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那简直毫无意义。”^⑤因此，解析中国共产党 90 年发展历程的逻辑底蕴，不能限于“过去”合法性的解释和证明，还包含着“当下”合法性的诸多命题，更深含着面向未来、走向未来、改变未来、掌握未来的逻辑指向。可以说，始终遵循“社会进步运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历时 90 年能够即使遭受沉重打击依然生生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2 页。

③ 我们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善于从历史中寻找依据；西方则是从“抽象原则和理念”出发检讨政策的有效性。在全球化时代的境遇下，我们必须兼具二者。

④ 问题在于：尽管人们熟悉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结论，但世界资本“文明化”的现实以及当下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决定了“回到马克思”的脆弱性。在理论及实践上“超越资本”，则是“中国模式”对世界进步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真正落脚点。

⑤ [美] 罗德里克·麦克法科尔、费正清著，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1949—1965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十四卷序》。

不息、保持勃勃生机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创新、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核心逻辑依据。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一贯秉持的世界历史的眼光看,反思中国共产党 90 年发展历程所具有的意义,一开始就具有直接的世界历史性,而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逐渐繁盛愈加鲜明和突出,并对全人类的发展观、进步观与文明观以及实践路径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价值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出现关于“政党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各种讨论,这是当代社会发展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现代性问题。政党的诞生(绝非一个点,而是一个过程)及后果标志着社会运动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针对各类“政党难题”,有人归结为信任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等,但深入分析会发现,这只是“政党危机”的结果和体现形式而已,并未揭示出背后的深层根源。如果不能推动或推动社会进步的力度强度不大、效果不显著,那么在日益强调竞争、变化、创新的语境下,该政党必然会遭遇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 90 年发展历程及其未来命运的反思,也基于此。

一、从社会进步到社会进步运动: 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主题和实践特征

“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①“世界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②从人类文明史尤其是近代文明史演进史的角度看,“社会进步观”已替代“历史循环论”、“神证论”,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一个核心的思想主题。而检视社会进步观念的真实性、真理性并促进其发挥巨大威力的方式,则体现民众“相信和致力于社会进步运动有着充分的理由”^③,拥有强烈的实践特征。

(一) 社会进步: 改变历史的逻辑进程

任何一般、抽象、普泛意义上的“进步”,皆基于一定社会和历史,其实质是

^①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8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63 页。

^③ “如果我们想判断一个已知的行动或信念是否是合理的,我们必须问这些行动或信念是否有充分的理由。”[美] 拉里·劳丹著,方在庆译:《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7 页。

“社会进步”。作为一个“近代概念”，“进步”源于 17 世纪的启蒙运动。其特征在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充分地表达出来。孔多塞反对人类悲观主义，致力于文明发展的线性史观，认为进步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确凿无疑的希望”，“越发接近于囊括真正关心到人类幸福的一切东西在内”，“其归宿只能是人类自身的完善化”，在摆脱“进步之敌”后，人类必将“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①。显然，追求进步的乐观精神被认为是打破“人类命运永恒枷锁”的一道符咒，具有突破“神学控制”的循环论、末世论，具有强烈的主观价值及道德判断，甚至情感联想属性^②。无论在国家、制度选择层面，还是个体发展角度，进步皆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从“不进步”走向“进步”成为主流的价值判断和行动标准。与此相反的则是保守、落后、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③在观念形态下，“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④。“进步”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的“光明”的价值要求，而“非进步”语义上的“停滞和倒退”往往代表着黑暗与落后。

“进步观念”之所以被接受、传播的一个关键机制在于：其已经进入“文明思想”的核心，成为诠释和判断“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国家一个个消退、灭亡，信仰盛行又失去魅力，政治和社会不断变动，但只有进步本身依然持续进行”^⑤。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看，“文明”之所以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源于 15 世纪初欧洲人对“被发现新大陆”居民“野蛮、蒙昧、无知、不开化、不卫生、语言含糊、没有隐私”的一种强烈优越感，由此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文明观”，即相信开拓、冒险、进攻的“进步精神”成为文明的核心要素，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世界殖民主义的扩展，得以推广和普及，最终在 18 世纪成为一种先进的、并居于主流地位的文明形式。自此“落后就要挨打”所蕴涵的强者逻辑、发展逻辑、进步逻辑成为全球空间的一个“主流逻辑”，崇尚“进步”的文明优越感成为压制其他文明类型的“合法而典型”的逻辑根据。

与“进步”相伴、并为“进步”提供科学支持的一种重要思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此意义上所理解的“进步”无疑等同于“自然竞争”意义上的

① [法] 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87、204 页。

② [美] 拉里·劳丹著，方在庆译：《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 页。亦见 [法] 乔治·索雷尔著，吕文江译：《进步的幻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3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68 页。

⑤ [美] 欧文·佩基著，蔡昌雄译：《进步的演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 页。

“进化”，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进步者”无疑作为“进化”的必然产物。由“进化”的科学性进一步探究会发现，科学进步、知识进步、技术进步等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撑物和验证物。正如孔多塞所论“进步学说当然出自一个征服性阶级的抱负，这个阶级对它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自己已经为夺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头脑中有宏伟的改革计划。如果我们不对这个阶级所持有的科学观念做出确切的说明，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想法”^①。从总体上看，现代社会的文明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人们“不再希望天堂生活，而是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堂”^②。相信科学和真理，通过人类自身的制度进步、科技进步来阻止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危险与邪恶。

在所有的神祇、宗法关系被“进步”、“进化”铲除后，“自然性与神性”退出“现代文明主体逻辑”，在“文明殿堂”中重新树立起“进步之神”的“新偶像”。“进步之神”以更高更强、始终向前的指令号召我们前进，以至于“进步人士”、“进步党”、“进步阶级”、“进步文化”等成为社会“先进性”的鲜明标志。

“在现代人中，实际是由欧洲和美国构成的观念早就过时了”^③，这句话仅具有“地理意义”，但就“资本文明”所塑造出来的现代文明观念而言，“欧美观念”依然占据着世界文明进步的主流地位，成为许多民族和国家争相模仿、攀附的重要对象。与强调竞争、线性发展、无限进步的现代文明观念相比较，“中华传统”视野下的“文明”是一个强调以自然、稳定、循环为主要特征的结构状态，其完整的“文明故事”及“文明精神”是不争、礼让与和谐。可以想见，仅就纯粹的逻辑而论，如果两种文明类型相遇并产生直接的冲撞，那么，显然前者具有“勇往直前”的战斗力，而后者则以“老大帝国”的面貌受到贬损与挤压^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战败史”，又一次成为资本主义宣布自己“文明优越性”的新案例。

（二）社会进步运动：探寻文明的历史进程

从逻辑转换的角度看，任何社会进步观念皆涉及对当下及未来社会发展状态的认同或不认同，是各种情感、价值的“综合结果”，具有“行动”的内在倾向，包含了“某种主动的创造性的因素”，但要使之转化为“社会进步运

① [法]乔治·索雷尔著，吕文江译：《进步的幻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② [美]利奥·施特劳斯著，丁耘译：《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③ [美]菲利普·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页。

④ 西方列强“性情暴躁、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结果，“横施暴行”的“外国人常常无耻的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彬彬有礼的“野蛮”受到性情暴躁的“文明”的无情摧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7、178页。

动”还必须具备理论、组织的各种条件。

对于社会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无论积极还是消极，无不是以“社会运动”形式体现出来。中外历史上的各种奴隶革命、农民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变法运动、护法运动、复辟运动等，欧洲近代史上的城邦议会运动、军事征服运动、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工业革命、城市化运动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形式，真正的历史书写无不以“社会运动”为主要叙述对象与内容^①。

显然，在逻辑上，“社会进步运动”隶属于“社会运动”范畴^②，是一种以某种进步理论为指导，具有纲领、组织性、目的明确的“社会行动”。“战争、议会化、资本化和无产阶级化”被视为“社会运动”的典型内容^③。其存在两方面的逻辑特征：其一，必须以“进步理论”为指导或追求进步为指向，而任何缺乏进步理论指导的社会运动则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其二，必须具有大众性、组织性、行动性。“革命的洪流不能限制在狭窄的河床里，而是要波及整个大地。经济方面的诸多愿望，社会方面的诸多渴求，均通过政治斗争获得解放，而殖民地社会的许多方面亦已被这一释放的力量所深深改变。阶级关系、奴隶制度、土地制度、商业惯习、智力和宗教生活的精神和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被革命的变革之手所触碰，所有这一切都以进步的形式呈现出来。”^④当然，社会进步运动观念要从有差异的个体性向社会性的转换，“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⑤。

（三）资本“文明化”：全球进步的现实路径及其内在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对于“世界进步”最核心的贡献就在于将抽象理性和人文意义上的进步，转换为聚焦“资本财富”的“进步运动”。“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出现

^① 梁启超认为：“一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国民运动史”。除宗教、学术、文艺上种种运动不计外，专就政治上说，那关于全部的，例如人权宣言运动，殖民地独立运动，民族建国运动，普通选举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等；那关于局部的，例如放奴运动，妇女参政权运动，禁酒运动等。《梁启超全集》第1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页。

^② 社会运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相互关联的、易于辨识的、能够被广泛运用的大众政治形式。”[美]查尔斯·蒂利著，胡伟钧译：《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③ [美]查尔斯·蒂利著，胡伟钧译：《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④ [美]詹姆斯：《作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波士顿，1956年版。引自[美]查尔斯·蒂利著，胡伟钧译：《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9页。毛泽东重视“推动”的重要作用，“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地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

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巨大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①斯杰伯格在描述世界历史中资本发展的重要贡献时,认为财富的巨大涌流塑造出真正意义上的“财富时代”,造成了“大量财富的再分配,这使得财富这个标志阶级差别的象征在今天更不显著”。下层居民也能买得起“体面的东西——服装、汽车、电视等”,以至于在外观上已经很难区分“蓝领工人与中产阶级”^②。这显然是以“财富运动”佐证“进步意识形态”,由“资本财富”证明“社会进步”的内在逻辑。

因此,一个基本的“文明事实”无法避及,即在我们谈论文明、进步之类的话语时,主流的文明和进步逻辑皆由西方所控制、支配和建构。或者说,对于“进步的信仰”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不再每天都是同样的东西,不再每天都是对人的绝对职责与崇高尊严的相同的提醒,每天都是些新的玩意,它们是不会提醒什么绝对的职责和成功尊严的;专业化,关于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的越来越多;在实践上不可能专注于非常罕见的本质性的东西(人类的整全性有赖于此);用一种虚假的普遍性、用各种各样缺乏激情的兴趣与好奇的刺激来补偿专业化的后果;普遍的无教养与不知不觉盲从的危险。”^③这是资本文明的主色调。

尽管“资本运动”开启了“全球社会进步运动”的新时代,但“资本逻辑”的核心是致力于追求财富、富者更富,致力于发达资本对不发达资本、资本(家)对劳动(者)、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胜利,而非更广泛而真实的“财富公平与正义”。资本运动所具有的进步性,“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得不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始终“是富人的天堂”,受到富人、想成为富人的人以及由此影响和决定下的政治、文化的称赞与追捧。而对穷人而言,这“始终是陷阱和骗局”^④。而要走出西方文明控制下的“文明与进步”话语机制,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贫富”的文明评价问题。一旦“世界上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则是国家舞台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中国有句话:愈富的人愈悭吝。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⑤。“任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进步运动,实际上都是致力于塑造出“资本意义”上更多的“富人”,而“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9页。

^② [美]吉丁·斯杰伯格:《美国的社会阶级正在变得更僵化吗?》。引自[美]李普塞特著,张华青等译:《一致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③ [美]利奥·施特劳斯著,丁耘译:《海德格尔式生存主义导言》。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者阶层”则始终处于“资本意义和资本逻辑”的“底部”。

面对“资本文明”绝对的单一逻辑钳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资本文明”的多重后果及其解构可能。如果向前追溯,会发现早在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建构现代性的进步话语时,卢梭、康德就已经明确表示对“进步”的怀疑与批判,“在有关未来的自由的行为方面,人类必须放弃这种引导或指引”,即使人类的理性行为也无法明了“自己可能从中期待着什么样的效果”^①。当然,这反映出人类趋向未来的“道德指引”的努力,属于一种“道德判断”,促使人类朝着“善行”的方向前进。关键问题在于“进步”已经成为一种“最合法”的“权利与义务”,成为一种压制“非进步”话语的工具。可以说,当前进步话语的主流声音依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现代文明发展无疑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征服人类自身、改造人类自身的能力,“迅猛的增长”成为判断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无法舍弃的指标。这里所隐含的文明事实是:“文明”让位于物质主义的增长,资本文明以及其范围内的科技创新的“体积”不断膨胀,“无限增长”是资本文明的内在逻辑要求。

“资本文明化”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如果将这一“事实”扩展为“文明化逻辑”,“这样,一切坏的特性,即一切真实的资本特性就都从资本中被排除掉了”^②。我们绝对不能凭借“资本文明”存在的某些“客观事实”,就将“资本文明化”当成一种文明的“普遍要求”。实际上,西方话语的“进步”、“发展”作为意识形态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撼动,“人们丧失了方向感,对进步的信念衰微了,而只有共产主义以原来的力量保持着信念”。在此意义上,我们重新反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理想社会”,“世界社会的人是完全自由的,其之所以如此,最终的缘由是一切专业化、一切分工都被扬弃;一切分工已被归诸私有财产。世界社会的人可以上午狩猎,中午绘画,下午弄哲学,太阳下山以后在花园里劳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万事通”(jack-of-all-trades)^③。这一景观完全与资本主义文明范式相反,扬弃了资本主义所坚守的分工效率、市场交换原则,是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

二、政党发展史：基于社会进步运动的反思

政党的出现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政党社会动员程度也已成为

^① [德] 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5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67 页。

^③ [美] 利奥·施特劳斯著,丁耘译:《海德格尔式生存主义导言》。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9、130 页。

一个国家政治生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既然社会进步运动是促使政党诞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政党也成为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探求“社会进步运动与政党运动”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可能发生的裂隙，成为探究现代社会文明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命题。以此看待“政党运动”的特点，可以发现，其能够聚集、整合、同化差异化的个体进步观念与进步行为，将其具体转化为更具“社会性”的运动形态，以“群体动力学”的强大机制实现推动社会运动的目标。因此，与基于抽象意义上、一般意义或个体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相比，“政党运动”具有鲜明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发挥着更为激烈的改造社会、推进社会运动的功能与特征。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始终站在社会进步运动的最前列，把握社会进步运动的脉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

（一）政党诞生：社会运动的现代化

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无论神权政治、宗法政治还是王权政治，都极力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绝对的控制地位，“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相互贯穿、密不可分，仅仅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广大人民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在强大而神圣的神权、王权的逻辑框架下，该问题不可能得以解决，这也是东方抑或西方社会，传统“政治逻辑”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尽管在前资本主义也出现“党”之类的词语和称呼^①，但始终处于政治边缘，因为任何“党”的产生与发展必然对神权、王权的“唯一合法性”产生巨大的冲击。

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走出神权、王权的逻辑循环，开启了“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社会”的现代逻辑。国家的政治权力并非源于“国家本身”、而是源于社会民众的授权，“代表民意”并接受民意的监督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内容。显然，要使这种基于“民意”的政治逻辑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就客观上要求社会具有“一定”的组织化程度，而非“一盘散沙”，需要强大的“政治中介机构”来反映和代表民意，以保证国家“合乎程序”地运转，进而将国家与社会联结起来^②。就此而言，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社会发育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更是“民主经验”发展的客观后果，其与“民主制度的发展息息相关”，与“公民投票权的普及及

^① 中国历史上党争、党祸、党羽、党锢、朋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皆为贬义，西方 party 的原初含义只是生活上的伙伴。在政党诞生之初，许多人把政党章程、宗旨和组织类比于宗教组织。美国民主制度的缔造者之一杰斐逊曾指出：“如果说不参加政党就不能进入天国，我宁可不去天国。”[美]詹姆斯·伯恩斯著，陆震纶等译：《民治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1 页。

^② 现代西方政治学的起点是《利维坦》、《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其核心逻辑是“越过”自己所处的神权和王权，通过“自然状态”建构现代政治的合法性。